



牛致功

史建唐

唐史研究丛书

陕西人民出版社

11.3411./21



1080375

李
渊
建
唐
史
略

R1724/1

牛
致
功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李渊建唐史略

牛 致 功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25 插页 2 字数 7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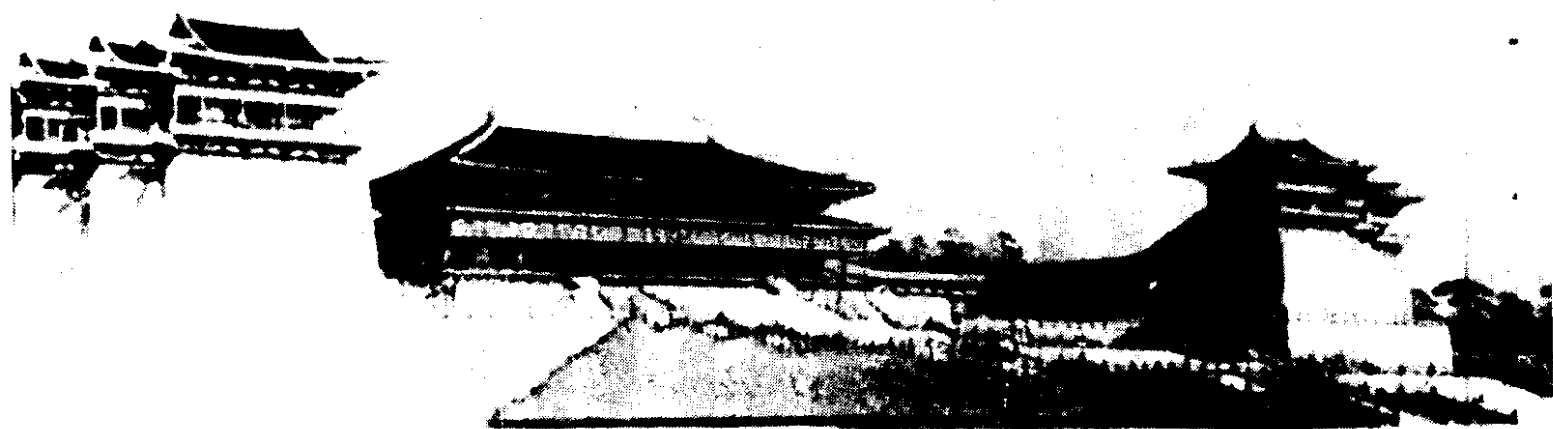
1983 年 2 月第 1 版 198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统一书号: 11094·86 定价: 0.49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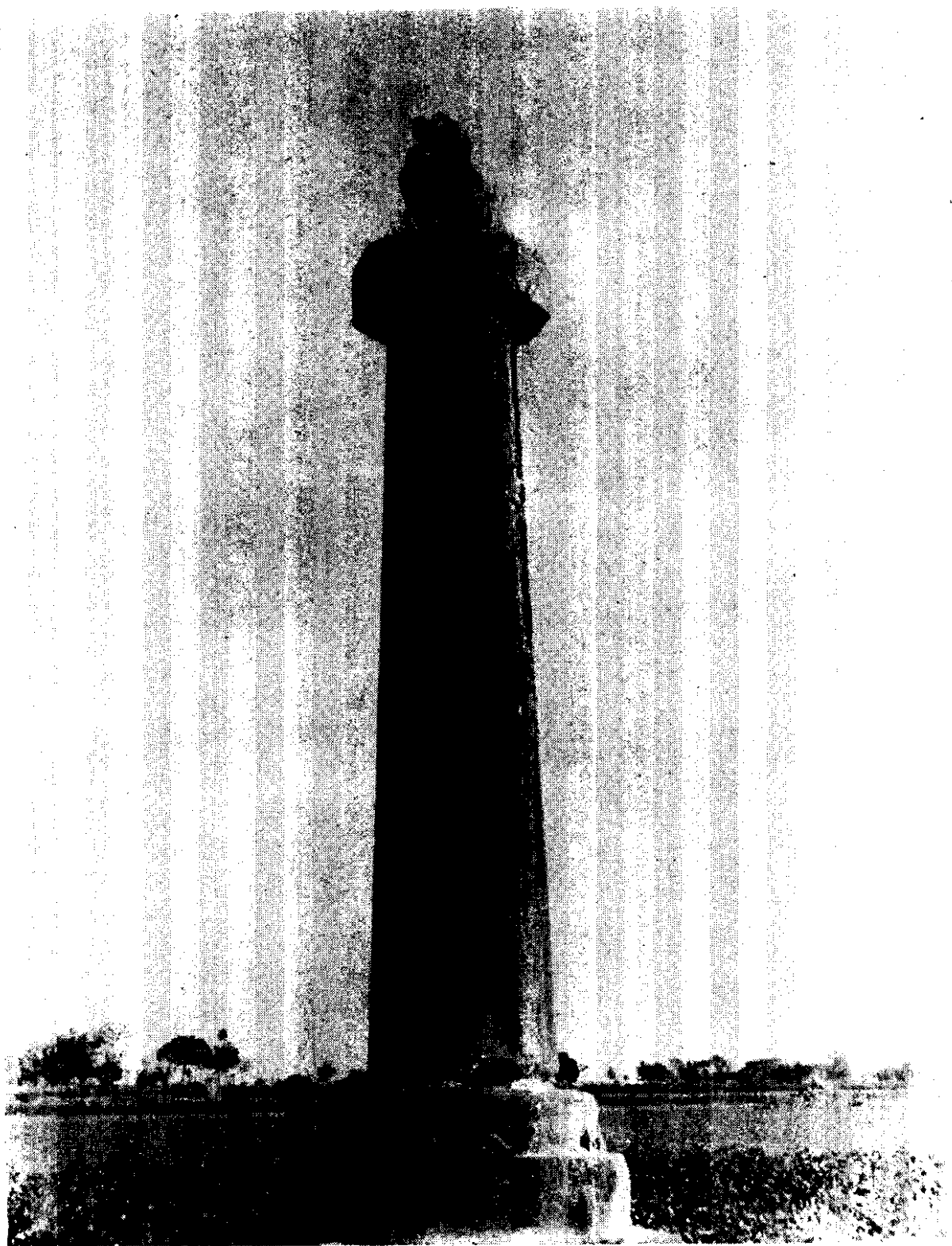
唐高祖李渊像



大明宫含元殿复原图



李渊的陵墓——唐献陵



献陵前的华表



献陵前的石虎



献陵前的石犀

前 言

这本小书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李渊从太原起兵以后的活动，试对李渊进行评价。

关于李渊的评价，以前未见有人系统地论述过。解放以后，范文澜同志在《中国通史简编》一书中论及李渊。他认为李渊“起兵取关中，建立唐朝，主要依靠唐太宗的谋略和战功，他本人并无创业的才干”。在其他人的历史著作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在唐王朝的创建过程中，李渊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以及李渊作为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如何评价，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

征诸历史事实，李渊改朝换代是蓄谋已久了。他深谋远虑，有勇有智，自起兵太原，进军关中，攻克长安，以至最后建立唐朝，都是主要的决策人。当别人劝他起兵的时候，他早已胸有成竹。在处理和突厥的关系与对待隋代王侑的态度上，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和政治远见。他的政治作风，也表现出一个创业君主的精神面貌。在帝位的继承上，他的基本倾向是欲以李世民代替李建成的，但不象隋文帝那样轻率，而是采取了颇为慎重的态度，给李世民争夺太子地位的胜利提供了条件，最后又把李世民杀李建成的既成事实合法化，可

见，他并不是偏袒李建成的。“玄武门之变”以后，他很快让位，也是值得称道的。因为这时他已年过六十，丧失了进取精神；而李世民才二十七岁，正雄心勃勃，在政治上、军事上显示了一定的才能。从太原起兵到“玄武门之变”，李渊曾经多次要立李世民为太子，正是对李世民颇为满意的标志。如果到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李渊死后李世民才做皇帝，无疑就不会使李世民的才能较早的得到发挥。李世民采取各种措施，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虽然是为了巩固与发展地主阶级的政权，对历史的前进也是有积极作用的。因此，李渊让位于李世民，即使是为形势所迫，也不能否认其积极的作用。

研究唐初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当隋末农民起义军正在推翻隋炀帝的残暴统治的时候，李渊乘机进兵关中，攻取隋都长安；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另立代王侑为帝，争得了事实上的主动权；接着，又消灭异己势力，镇压农民起义军，逐步统一全国，成为地主阶级新的代理人。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是封建时代的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实际才能。而李渊形象的被歪曲和历史作用的被贬低，是受了一种因袭的历史观点的影响，特别是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运用所谓“春秋笔法”直接影响的后果。

司马光认为，君臣关系和夫妻关系一样，“妇之从夫，终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无二；此人道之大伦也。苟或废之，乱莫大焉！”因为“正女不从二夫，忠

臣不事二君”是“大节”。忠臣应该“忧公如家，见危致命，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为臣不忠，虽复材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①按照这种理论，李渊是隋朝的地方官，即使隋炀帝残暴异常，胡作非为，李渊也只能“强谏力争”，不能起兵造反；否则，就是“为臣不忠”。但事实上李渊起兵造反了，又迫使代王侑王让位，建立了唐朝。后来，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中被黄袍加身，取后周而代之，建立北宋，也和李渊取隋而代之，建立唐朝，大体类同。司马光如果指责李渊不忠，怎么会不刺痛北宋的皇帝呢？正因为这样，司马光不能宣扬李渊怎样有计划有准备地起兵反隋，致使人们感到他对隋炀帝不忠，而只能是把李渊写成为群下所迫，自己无可奈何，才任人摆布的。这样一来，赵匡胤被黄袍加身，拥为皇帝，岂不也就有了先例了吗？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是千方百计为北宋皇帝巩固其统治地位着想的。这一点，他也决不会忽视。由此可见，表面看来是司马光贬低李渊，实际上是为李渊文过饰非，赞颂其忠。

既然唐朝建立了，宋又是继五代以至隋、唐而来的封建王朝，当然唐的正统地位是应当肯定的。事实上，《资治通鉴》不用大业十三年而用恭帝义宁元年以系年的办法，正说明司马光肯定了李渊从隋代王侑手中取得帝位

^①《资治通鉴》卷二九一，显德元年。

的正统地位。

唐朝的正统地位肯定了，建唐的功臣当然应该受到赞扬。司马光以“忠”颂扬了李渊，同时又以“孝”、“功”称赞了李世民。例如，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李世民初劝李渊起兵时，李渊毫无精神准备，大吃一惊，要执李世民“以告县官”，李世民说“必欲执告，不敢辞死”^①。服从父命至于死，当然是孝子了。这正符合司马光“父之命子不敢逆”，“逆父之命，子不孝也”^②的思想。另外，司马光又说：“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显然这是把建唐之功完全归之于李世民了。这也是有其原因的：其一，李世民确有一定的才能，在建唐和做皇帝时都有一定的功绩；其二，以赞颂其功绩的手法掩盖其夺取帝位的违“礼”行动。赵光义和李世民一样，也是从哥哥手中取得帝位的，但宋太宗以后的北宋皇帝，都是赵光义的后代。面对赵光义的后代当然不能指责弟弟从哥哥手中夺取帝位是不对的。所以，赞颂唐太宗之功，实际上是为从哥哥手中夺取帝位者文过饰非。正是这种原因，仅根据《资治通鉴》所罗列的现象，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李渊是庸庸碌碌的无所作为者，李世民是真正的“创业垂统之君”。^③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义宁元年。

②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十四。

③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

我写的这本小书，是我初步学习和研究唐史的一种收获。对李渊的评价，仅仅是一种探索，未敢唐突前贤，只藉此表示一己之见。由于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得不够，史料的掌握也很有限，所以，不论立论或资料引证上很可能有错误之处；不过，缺点错误一旦被同志们指出以后，就会使自己得到鞭策和鼓励。这正是我敢于写这本小书的动机所在。

在写这本小书的过程中，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有关同志曾经给以热情的鼓励和支持，黄永年同志看过大部分初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图书馆、资料室的同志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些，都是这本小书能够写成的积极因素。在此，向这些同志表示衷心地感谢。

牛 致 功

于1981年春节

目 录

前 言

乘农民起义之机发展势力·····	(1)
太原起兵·····	(8)
卑辞推奖以骄李密·····	(14)
攻取霍邑·····	(21)
威胁河东，西取长安·····	(27)
从唐王到皇帝·····	(32)
东败屈突通，西平薛举，全力攻固关中··	(37)
平河西，执李轨·····	(41)
大败刘武周，巩固太原·····	(44)
镇压河北农民军，攻取洛阳·····	(49)
平萧铣，统一长江中游及岭南·····	(61)
统一长江下游与东南·····	(67)
镇压刘黑闥和徐园郎起义军·····	(79)
对突厥的既战且和政策·····	(88)
李渊的政治作风·····	(96)
重视发展生产，遏制佛教泛滥·····	(109)
“玄武门之变”与唐高祖让位·····	(114)

乘农民起义之机发展势力

李渊自称是十六国时凉武昭王李暠的后代。他的祖父李虎是西魏八柱国之一。李虎因有功于西魏而被赐姓大野氏，北周杨坚作相时，又复姓李，死后追封为唐国公。李渊的父亲李昞，曾为北周安州（今湖北省安陆县）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封唐国公。李昞死后，李渊又袭封唐国公。隋代替北周后，李渊被补为千牛备身（皇帝亲身护卫）。由于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是李渊的姨母，因而更有利于李渊在政治上的发展。李渊先后做过谯州（今安徽省亳县）、陇州（今陕西省陇县）、岐州（今陕西省凤翔县）等州刺史，大业初年，又先后为荥阳（今河南省荥阳县）、楼烦（今山西省静乐县）二郡的太守。当隋炀帝进攻高丽的时候，李渊为之督运军粮于怀远镇（今辽宁省辽阳市西北）。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杨玄感起兵以后，隋炀帝又命他为弘化（今甘肃省庆阳县）留守，并命关右诸郡兵皆受其节度。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隋炀帝又以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镇压了毋端儿、敬盘陀等起义军。义宁元年（公元617年）初，李渊为太原留守。就在这一年，他起兵反隋了。

当李渊去做太原留守的时候，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正在全国遍地燃烧。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已在中原屡战屡胜，逼近东都，致使“号为名将”、“威振东夏”^①的张须陀也被打得落花流水，全军覆没。张须陀被杀以后，“所部兵昼夜号哭，数日不止，河南郡县为之丧气。”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的林士弘，由于大败隋军，“豪杰争杀隋守令，以郡县应之。其地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皆为所有”^②。江淮的杜伏威，河北的窦建德，也无不节节胜利，使隋炀帝束手无策。在统治阶级内部，杨玄感的起兵，已经标志着矛盾的激化。在这种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隋炀帝已经无力控制全国局面，李渊就乘机崛起了。

早在太原起兵前四、五年，也就是农民起义开始爆发，隋炀帝正在进攻高丽的时候，李渊就有取隋而代之的打算。例如，当宇文士及投降唐朝的时候，李渊对裴寂说：“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宇文士及与李渊确实早已有了很深的关系。当李渊为殿内少监，士及为奉御时，二人即“深自结托”。后来，宇文士及随其兄宇文化及到黎阳（今河南省浚县）时，李渊即“手诏召之”，士及也“潜遣家僮

① 《隋书》卷七十一《张须陀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大业十二年。

间道诣长安申赤心，又因使密贡金环。”李渊非常高兴，对侍臣们说：“我与士及素经共事，今贡金环，是其来意也。”宇文士及到了长安，也向李渊表白说：

“臣早奉龙颜，久存心腹，往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后于汾阳宫，复尽丹赤。”^①宇文士及投降唐朝，是在武德二年（公元619年）。这时李渊说他六七年前与宇文士及谈过“天下事”，当然是在太原起兵前四五年前的事了。五年前，李渊为弘化留守。由于隋炀帝对他很不放心，特“徵诣行在所，渊遇疾未谒，其甥王氏在后宫，帝问曰：‘汝舅何来迟？’王氏以疾对，帝曰：‘可得死否？’渊闻之，惧，因纵酒纳赂以自晦。”^②隋炀帝对李渊如此愤恨，岂不正是促使李渊背隋而另找出路吗？由此可见，李渊与宇文士及因“素经共事”而“言天下事”；“往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并不是偶然的。不可告人的密事，除了政治野心，又是什么呢？

其次，从李渊和武士彠的关系中，也可以看出李渊的深谋远虑。武士彠，是并州文水（今山西省文水县）人，李渊“初行军于汾、晋，休止其家，因蒙顾接，及为太原留守，引为行军司铠。时盗贼蜂起，士彠尝阴劝高祖举兵，自进兵书及符瑞，高祖（李渊）谓

①《旧唐书》卷六十三《宇文士及传》。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二，大业九年。

曰：‘幸勿多言。兵书禁物，尚能将来，深识雅意，当同富贵耳。’”^①既然李渊劝武士彠“幸勿多言”，以免将来不能“同富贵”，当然说明他是一个谨慎而有远见的政治家。《旧唐书》的作者说：“高祖审独夫之运去，知新主之勃兴，密运雄图，未伸龙跃。”^②这种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再者，在隋炀帝末年，李靖为马邑郡丞时，“会高祖击突厥于塞外，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③；刘文静在李渊为太原留守时也“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结託。”^④都同样说明在太原起兵之前李渊是早有思想准备的。

其实，李渊不仅在思想上有所准备，而且也是积极行动的。例如，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十二月，隋炀帝命民部尚书樊子盖发关中兵数万镇压绛郡（今山西省新绛县）的起义军敬盘陀。“子盖不分臧否，自汾水之北，村坞尽焚之。”起义群众凡“有降者皆坑之，百姓怨愤”^⑤。压迫愈甚，反抗愈烈，参加起义军的群众愈来愈多了。于是，隋炀帝又诏以李渊代替樊子盖。李渊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既镇压，又设法诱降，于是，数万人参加了李渊的部队。另外，他还积极网罗对自己有

① 《旧唐书》卷五十八《武士彠传》。

② 《高祖纪·史臣曰》。

③ 《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

④ 《旧唐书》卷五十七《刘文静传》。

⑤ 《资治通鉴》卷一八二，大业十一年。